

略论吴楚文化的异同

王廷治

吴文化和楚文化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由此,吴楚文化有不少相似的内涵,而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使两者各具特色。

吴国的建立,目前学术界出现三说:吴太伯、仲率领奔吴立国说;周章立国说;吴王寿梦立国说。以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衡量标尺,当以后说为长。当吴国开始兴盛、向外开疆扩土时,其北方的地盘已为中原诸强瓜分殆尽,东临大海,唯有向南与越人争锋、往西与楚国争强的机会,可以说黄花菜已经凉了半截。这是造成吴国西向争夺、吴楚关系紧张的前提。

吴楚发生接触,首见记载的是楚庄王十三年(前 610 年)众舒叛楚,楚国伐灭舒蓼后向东扩展,与吴人、越人订立了同盟。此时还不清楚吴人的首领是谁。事隔 17 年,楚共王七年,吴王寿梦二年(前 584 年),楚亡人申公巫臣从晋国出使吴国,“呈子寿楚说之。……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郟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① 这便拉开了吴、楚争夺的序幕,直至吴国灭亡的 100 余年中,两国发生大小战争 20 多次,每 5 年就要打一次,真可谓烽火连年,频繁战争可能促使双方取长补短,对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消耗和破坏可能与促进是成正比的。然而,楚国先后有在本国受迫害的官员逃往吴国,吴国也有官员逃往楚国,双方又各有战俘,这就理所当然地使两种文化产生必然的交往。

就吴文化与楚文化的生成机制而言,它们相似之处体现在两国先君都是从中原入主当地的,因而吴文化与楚文化都有相当程度吸收华夏文化的机制;吴国与楚国的民族结构中,双方都曾融进了被中原称之为蛮、夷、越等种族成分;就文化生成的地域而言,两者是相邻之国,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也基本接近。这些便造成了吴楚文化的必然的内在联系。

1、吴楚先君都从中原入主其地,以及吴楚文化接受和吸收华夏文化的机制。

吴先君即周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奔吴后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吴民族,后来建立了吴国。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吴太伯所奔之吴非后来吴国之吴,而是在今宝鸡市西北的吴山一带;所谓荆蛮,乃是居住在宝鸡市渭水两岸的弓鱼氏,是巴族的一支^②。然而,笔者仍然有一些可信史料可以确证吴王室为姬姓周王室之后,从而进一步证明

^① 《左传》成公七年。

^② 《吴文化研究论文集》第 98、99 页。

吴太伯奔吴,即后来吴国之吴;荆蛮即生活在当地的蛮族。《史记》的记载不误,《左传》襄公十二年:“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祔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鲁襄公得知吴王寿梦卒的通报后,在周庙举行哭丧仪式,是符合周王室礼制的。可见王室确为吴仲雍之后,周之胄裔,姬姓。《左传》昭公三十年:“吴,周之骨裔也,而奔在海滨,不与姬通,今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此又一硬证矣。《左传》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我为伯。’”此又一铁证矣。《国语·越语上》吴王夫差求越行成,遭拒绝后说:“寡人礼先一饭矣,君不忘周室,而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愿也。”有此数证,周之先君奔吴,实为不可移易的事实。而尹盛平先生所考证的宝鸡市渭水两岸居住着弓鱼族,弓鱼即攻敌,亦即句吴;太伯奔吴在宝鸡西北吴山一带。提法上似有不妥,如果说太伯曾在那里居住过,或被封在那里,后来出奔至江南、海滨,而仍保持其原来居住地的名号,故江南太伯、仲雍居地仍号句吴,建立国家后,仍然用作国名。这样就比较允当些。这里旨在说明吴先君确实是从华夏中原地区来到吴地的,从而说明吴文化在生成过程中确实吸收了华夏文化的养料。

当然,在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还有更多的机会吸取华夏文化。比如:吴多次参加中原诸国的盟会;晋国出于对楚牵制的需要,曾为吴国合诸侯;申公臣曾出使吴国,教吴乘车,教吴战阵;公子季札的原列国之游;齐庆封之奔吴;孔子弟子中有人言偃;等等。这些交往更加促使吴文化的华夏化过程。因此,吴文化越到后期,其文化特色就越不明显。

在楚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楚国先君是华夏族、东夷人、北狄人、西戎人还是南蛮土著人?也曾经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楚先君乃是华夏族高阳氏后裔的一支,南下江汉流域后,与南蛮土著融合成了楚民族。而嵩阳氏族属华夏,也得到了较为科学的证明^③。拙作《楚民族层次分析》曾经指出:“黄帝部族中高阳氏的后代,到陆终时代又开始分成数个氏族,其中季连族在荆楚,并与当地土著融合成为楚民族,因而在司马迁眼里,季连是举姓楚人的祖先。那么,楚族源就有两个,一是华夏族的一支,二是土著,而土著居民中存在着各种族集团。”^④张正明先生也说:“只是由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的交融,楚文化才在考古遗迹上显露出如芽方盟的特性和特色来。但楚文化毕竟有介乎华夏文化之间的主源,即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它左右着楚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这个主源,江汉地区要么华夏化,要么蛮夷化,不会生出一个楚文化来的。”^⑤这已能说明楚先君是华夏族的一支,从中原地区南下,与江汉间的土著融合后产生了楚民族,因此楚文化在生成过程中确实吸取了华夏文化的营养。其后,楚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还有更多的机会去吸收华夏文化的精华,如楚先君鬻熊曾为周文王师,周公旦之奔楚,王子朝之奔楚,老子之居楚,楚在春秋时代在中原地区的争霸,孔子、墨子等文化人、思想大家都纷纷来到楚国,为楚文化的机体中输入了不少华夏文化的血液,已是无须赘述的历史事实了。

2、吴民族与楚民族的结构中都有蛮人、夷人、越人的成分,决定了吴楚文化具有地方特色的机制。

文化是人创造的。辨明吴民族与楚民族的构成部分,两种文化具有地方色彩的原因也就找

^③ 详见《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求索》1989年4;

^④ 《民族论坛》1988年2;

^⑤ 《楚文化史》第26页。

到了,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昭然若揭了。在讨论吴人的族属问题时,已经出了荆蛮说、越族说、句吴族说。而笔者以为吴人的族属不是单一的,而是融合的结果。作为吴王室的成员,其族属华夏族的姬姓周人。而其国民则有越人、荆蛮人、句吴人,也有夷人。上引《左传》成公七年文,“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左传》昭公四年:“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徐人的主体为夷族。这里提及的徐吴通婚关系,而且吴的北部是淮夷的聚居地,因此吴国的兴盛,不可能不与夷人发生民族间的融合。越人亦然。可惜在作吴民族结构分析时,不象楚民族有较多的文献资料。尽管如此,说吴民族系由荆蛮、越人、夷人等融合而成的,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楚民族中的土著成分恐怕要比吴地的土著要复杂得多。首先有鬼方人。史传随终氏娶鬼方氏妹为妻,季连即为他们的后代,另有苗人、百越、百濮群舒、汉阳诸姬、荆蛮人等,是于史有证的。是否有夷人,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加以证明,但是楚人确实征服了不少淮夷,拥有不少淮夷的居住地。楚民族中有夷人成分,但不是主要的。由于笔者已有《楚民族层次分析》一文发表,就不赘述了。

要言之,在明了吴楚民族结构的基础上,两种文化内涵的相同性和天造的内在联系也就不言自明了。

3、吴楚两国不仅在地域上相邻,而且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也基本接近,吴、楚文化本来就在同一个文化圈中。

吴之西境为楚之东界。从地理环境看,楚国南部有长江,汉水从西北贯串东南,北部有淮河,境内有硕大无朋的云梦泽,有江、汉淤积而成的江汉平原,楚国是湖河港溪交织的水乡。吴国地处长江三角洲和江淮大平原,北有淮河穿过,境内三江五湖,河流纵横交织,也是水乡泽国。吴楚两国同在北纬30°—35°之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物产丰富。这就是伍子胥说的“陆人居陆,水人居水”的道理。虽然伍子胥说的是吴越的地理环境,吴楚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吴楚争夺激烈,正是吴可适楚、楚可适吴的缘故。

我们从吴楚文化的生成机制的分析入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吴楚文化都含有中原文化、夷人文化、荆蛮文化、越文化等文化因素,也就是说吴楚文化之间必然具有的内在关系,具有相同的内涵。然而由于两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也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各具特色的方面。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时间发展有先后,楚国先于吴国,楚文化比吴文化发达;楚民族的结构比吴民族复杂,体现在文化上就更具有多样性,更丰富。

现在应该回答吴楚文化究竟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方面是各具特色的问题了。严格地说来,各种微观研究还远远不够,不足以供我们进行综合和概括。特别什么是夷人文化,什么是荆蛮文化,什么是越人文化等等,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标准尺度。因此笔者在此仅举例说明。

关于竹器。广泛地利用竹子,用作建筑物、交通工具、兵器、乐器、日用品、书写工具(竹筒、笔竿等),这是长江流域(包括上游的巴蜀)以及长江以南地区十分广泛的现象,我们也可说是竹文化。无论是先楚文化的遗址中,还是后来的战国墓葬中,都出土了大量使用竹子的遗迹,或竹器遗物。先吴文化的钱山漾遗址出土二百多件竹编器物,有篋、篮、箩、席、门扉等。从上古时代到今日属吴楚文化圈的广泛地域内,竹文化仍然十分普遍。当然各地出产的竹子有不同的品种,编制的竹器也有同有异,只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笔者曾经把荆楚、荆蛮之荆释为竹,正是立足于吴楚地域的竹文化这块土壤的。历来解释这个“荆”字虽有不同的说法,但多以为荆即楚木,楚木即丛木,亦即荆棘丛生三灌木,也有径释为紫荆条之荆。而《礼记·儒行》郑玄注“箠门圭箭”谓:“箠门,荆竹织门也。”《诗·豳风·七月》“塞向瑾户”毛传曰:“向北出牖也;瑾涂也。庶

人竿户。”孔颖达疏曰：“塞北出之向，瑾涂荆竹所织之户，使令室无空隙，寒气不入。”《晋书·刑法志》：“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支，围七寸二分者被斫。”这些资料可以明确地证实荆确实就是竹。详细的证明可参阅拙作《荆楚国名新探》。^⑥而这里主要说明吴地的土著所以称荆蛮，楚国同时也称荆，正是由于竹在江淮地区以及南方广泛地生长着，并得到大量的开发和利用；进而说是江汉流域的土著与吴地的土著都与竹有密切的联系。竹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流行不普遍、不广泛。尤其随着淮河以北地区变冷变干，竹科植物绝迹，竹文化就不再属于中原地区了，而是吴楚文化的特征，南方文化的特征。翠竹根连根，正是吴楚关系的象征。

关于印纹陶。我们一般都把印纹陶作为江南吴越文化的特色之一。其实广东石峡遗址中也出现过印纹陶。大溪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次为灰陶，纹饰以戳印纹最具特色。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多见实心或空心陶球，整个球面划成6个十字部位，24个等腰三角形，也就是几何印纹。这种陶球有何实用价值，至今还是个谜。而在这里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吴越地区出土的印纹陶与大溪文化陶器上的戳印纹和屈家岭文化中几何印纹陶球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为什么广东石峡遗址中也会出现印纹陶呢？能不能认为印纹陶是百越文化的特征呢？

关于养蚕业和丝织业。江南是丝绸的故乡。吴越两地具有悠久的养蚕业和丝织业传统，这是史有明证的事实。然楚国的养蚕业和丝织业也很发达，这一点已经得到考古证明。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丝织品，被誉为丝绸的宝库。难怪吴楚两国曾因小童在边邑卑梁（今安徽天水县西北）争桑而引起战争。这样，问题也就出现了。养蚕业和丝织业究竟起源于吴越还是发端于荆楚？是互相传授的还是自成体系的？这恐怕已是难以解决的谜了。不过，那长长的细丝结成的茧不也正是吴楚关系的象征吗？

关于船。如前所述，由于两国的地理环境都是水乡泽国，两国都拥有水上交通工具一舟楫。楚国有船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周昭王的时代。具有传奇色彩的“胶舟沉昭王”的故事，正是楚国有船的见证。春秋时代，楚国多次用舟师从淮河东下攻打吴国。吴国也多次派舟师攻打楚国，著名的柏举之战，就是吴国用船把军队运到楚国北境的。还有饶有兴趣的关于吴王乘船名“余皇”的争夺故事，楚人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余皇，并把它拉上了岸，而吴人乘楚人不备，又把它抢回了。围绕余皇的争夺，除了它本身的价值以外，恐怕与造船技术也相关。然而，舟楫也可视为吴楚关系的使船。

关于农作物和农具。我们知道吴楚两地都种植水稻，盛产稻米。收割水稻都需要镰刀，显然与水稻有极大的关系。至于其他农具、农耕技术等研究，还很不够。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相关联，如楚青铜器铭文有鸟篆，吴青铜器铭文也用鸟篆，但吴鸟篆比楚鸟篆更成熟秀美，是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呢？吴楚文化也有各具特色的成分，如吴国青铜剑闻名当时，而楚国却无法制造。楚国青铜器地方特色鲜明，而吴国青铜器主要带中原特色和受楚器影响较大。吴方言与楚方言差别甚大，发音也有很大差异。总之，吴楚文化的关系上有很多内容值得深入探讨和细致的考证。

⑥ 《大陆杂志》第八十卷第四期